

抗 議

期九十二第

和平運動之前途(特載)

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特稿)

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特載)

和平與亞與和平建國(上)

從開放長江說到日美調整邦交之途徑

論列強對日重開談判

日本在華之紡績資本

美貨暢銷對日本之影響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選載)

予欲無言集

汪精衛

周佛海

陳公博

仲平譯

顧南

劉鏐譯

王時傑

木軍譯

毛一波

葉紀懷

版出日一十月一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特載 和平運動之前途

汪精衛

——元旦在上海廣播——

二十九年這一年，無疑的是和平運動由開展而到達於成功。前幾日我在「豔電書後」中，已經有所說明了，如今再說幾句話，加以引申，作為二十九年獻歲發新的頌辭。

或若有人會問我道：「和平運動的意義，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們的實力如何呢？如果我們沒有實力，如何能擔負和平運動呢？」這種問法，我是很高興解答的。因為「不量力」，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我們最應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不可忘却「量力」兩個字，方纔能夠立國於東亞，立國於世界。

我對於所謂實力，想分析為兩部份：第一是軍事力量，第二是經濟力量。如今先說軍事力量。

如果說我們的軍事力量，夠不上做和平運動，那麼，夠得上抗戰嗎？這真所謂不值一駁的。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們如果知道量力，則應該誠意的努力的調整中日關係，並且把軍事方針確定於防共這一點，那麼，我們的軍事力量可以保存，而且可以發達。即在蘆溝橋事變以後，我們如果知道量力，在德國出來斡旋的時候，誠意的努力的謀和平之實現，那麼，軍事力量還不至過於消耗。即在近衛聲明以後，我們如果知道量力，誠意的努力的以謀實現全面的和，那麼，軍事力量雖然消耗，也還可以想法子來恢復。可是一誤再誤，以至於今，連所謂全面的和也在不可知之數了。軍事力量，這樣的消耗下去，只怕恢復無期了。然而沒有軍事力量，就不能做和平運動，也未必然的。普法之戰，法國的軍事力量，已經被普國擊破，為什麼法國還能恢復和平？上次歐洲大戰，德國的軍事力量，在停戰時候，幾乎可以說是全部繳械，為什麼德國還能恢復和平？天下祇有相類的事，沒有相同的事，我不是以法德例中國，我也不想中國蹈法德循環報復的覆轍。但是我想說明，一個國家，在軍事力量不幸而被擊破之後，這個國家，還有一種力量，可以存在。這一種力量是什麼？是民族意識。普法之戰，法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後，仍能保有法國。上次歐洲大戰，德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外，再加以種種不平等的束縛，仍能保有德國。至於中國，民族意識的存在，已經數

千多年。尤其數十年來，特別發達，不但我們自己知道，便是日本也知道的。不過我們對於民族意識的力量要估計清楚。我們不可妄自菲薄，以立國纔二十多年的捷克斯洛夏爲比；我們尤不可妄自期許，以爲只憑民族意識，便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要於估計清楚民族意識的力量之後，隨時隨地而善用之，用之於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用之於分担東亞永久和平的責任。這是我們所能做的，也是我們所應做的。我們必須明瞭所謂軍事力量是什麼，除了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之外，一切物質都是取給於人民的，一切精神，也都是由民族意識而來的。即所謂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也莫非是由人民培養而成，決不是如小說書所謂，一位金甲神，從天下降。所以軍事力量，不能包括民族意識，而民族意識，却可以包括軍事力量。可憐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前誤於軍閥，後誤於個人獨裁，把軍事力量，看得如同從天下降的金甲神一樣。於是，開口實力，閉口實力，把實力與軍事力量看成一物。從前以爲沒有軍事力量，不能抗戰，如今以爲沒有軍事力量，不能講和，這不是把軍事力量看得太重，却是把民族意識的力量看得太輕了。自然，我們將來還是要建軍，還是要鞏固國防，還是要綏靖地方，保衛人民，我們並沒有一刻忘記軍事力量。不過我們只要說明，決不是有了軍事力量，纔可以做和平運動！

如今再說經濟力量。

說到經濟力量：日本是先進國家，最近已駁駁然進於重工業發達的階段；中國是經濟落後國家，重工業還沒有萌芽，輕工業剛剛開始，還在幼稚時代，便遭着摧殘了，甚至號爲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因此有許多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攜，抱着絕對的悲觀；以爲兩個幼稚的國家，可以說提攜，兩個強盛國家，也可以說提攜，一個幼稚國家和一個強盛國家，却如何可以說提攜呢？這不是說狼與羊提攜一樣麼？這種論調，在戰前已經普遍，在戰後尤其深刻，以爲中國已經是一個落後國家了，如今再加上一個戰敗國家，所謂經濟提攜，還堪問嗎？無論如何，都是合作其名，獨佔其實，這是勢所必至無可逃避的。這種絕對的悲觀論調，浸淫起來，便成了以下的判斷：中國和歐美講提攜，還可，和日本講提攜，則絕對不可。因爲歐美離中國遠，來的人不多，來的貨色也不多，所以中國人還可以在歐美指縫裏過生活；日本離中國近，來的人多，來的貨色，各樣齊全，精粗美惡，應有盡有，所以中國人休望日本人手下留情，除了做苦力外，只有做叫化的了。總而言之，中國和歐美講提攜，歐美人嚼牛肉排，中國人還可以吃鹹菜飯；中國和日本講提攜，日本人吃『沙斯美』，中國人連湯也沒得喝了。由於這種判斷，便只能有以下的兩個希望：其一，日本火山爆發了，其二，歐美合起夥來將日本打倒。但這兩個希望，不

是等於望天打卦嗎？根本就不會成立的。至於枝節呢，幾十年來，中國往往發生抵制日貨的事情，這固然是由於政治的理由，然而在經濟的理由看來，却成了一種變相的保護政策。因為一方面正堂堂的以政治的理由來抵制日貨，一方面却正好偷偷摸摸的，以經濟的理由，來提倡國貨，於是許多國貨，在抵制日貨的環境之下，便應時而興了。但這是好辦法嗎？恐怕無論何人，都不會承認為好辦法的。十年以前，我曾經在香港一間客棧裏住過，和茶房談談天，我問他道：『近來生意好嗎？』他嘆口氣道：『嚶，廣東沒有亂，這裏生意怎樣好呢？』我聽了，真是哭笑不得。靠抵制日貨來提倡國貨，可不是和這種見識一樣？不用說根本，連枝節也不應該這樣的啊！然則中日經濟提携，真個的是這樣絕對的悲觀嗎？如果是的，和平運動，自然無從做起。但是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絕對的悲觀。我以為日本對於中國，本來有兩條路：一條是在軍事上謀征服，在經濟上謀獨佔。那麼，那是以中國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銷售商品，同時並行；第二期，中國人的購買力盡了，無所謂銷售商品了，就只有於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勞力，使中國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終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不通的。強行起來，必然遇着中國民族意識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識不是鎗砲所能擊破的，其結果必致徒勞而無功。所以這一條路，是斷斷乎行不通的。另一條路呢，便是近衛聲明所謂按照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携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得通的。上頭說過，中國號為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這不是中國地利之咎，而是人工之咎。如果以人工發達地利，使之科學化現代化，則中國的農業，不但能充分的自給自足，並且能充分的供給日本之需求。如棉花，如羊毛皆是。這些在農業知識上，已有定論，用不着多說。至於輕工業呢，中國在戰後，必須從事於恢復，這是不待言的。那麼會和日本的銷售商品發生衝突不會呢？普通看來，似乎必然衝突，不是日本商品布滿了中國市場，使中國的工業製造品無從銷售，因之工業無從發達，便是中國的工業製造品，將日本商品，從中國市場，驅逐出去。方纔所說絕對的悲觀論，即是從此出發的。但是中日兩國，難道不能適用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原則嗎？難道不能分別部門，以各顯所長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之中分別精製品、粗製品，以各盡所能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同一質量之中，更從事於數量的分配，以使之各如其量嗎？那見得就這般絕對的悲觀呢？中國的民族資本，本來有限，以有限的資本來經營各種工業，勢必至因分散而薄弱，對外不能競爭；而且資本愈少，則歸本及贏利之心愈急，內部因此亦時時發生破裂。這實在是幾十年來中國工業不振之最大原因。如果認定幾個部門，集中力量，從事經營，對外既不致因為重複而惹起衝突，而內部亦不致左支右絀，使事業中途停頓，有許多人恐懼日本貨品的廉價，以為必然

獨佔市場，殊不知中國若能用避免重複的辦法，對於自己所經營的部門，專心致力，則對於所放任的部門，正可利用日本貨品的廉價，減輕買價的負擔，而增加購買力，增加消費力，這豈不是較好的辦法嗎？不特此也，即使同一部門，也可從質量上數量上，想出平均發展的辦法的。舉一個例來說，二十六年的上半年日本在中國所辦的紗廠，以及中國自辦的紗廠，都獲厚利，其原因在什麼？在於二十五年之豐收，中國農民得到豐收，過年的時候，替自己或替子女多買一塊布，各紗廠就覺得銷路大暢了，說起來，真傷心，中國號為以農立國，號為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農民，但是農民所過的生活，是人的生活麼？不用說別的，衣不蔽體的現象，村鄉間觸目皆是。自然在上海跳舞場的人們，是不會看見的；可知陝甘一帶有些十七八歲的姑娘們，因為衣不蔽體，見了人就躲在土坑內啊！如果政治能修明，共匪能肅清，一切不必要的政費軍費能減少，則政府可以拿出大批的錢來，從事於農業之改良發達與輕工業之恢復，那麼一般農民收入自然增加了，購買力自然也隨之增加了，照現時的紗廠，再添十倍，乃至數十倍，也不怕沒有銷路。那裏見得便衝突呢？『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一偏之見，均不均都是分配問題，寡不寡是生產問題。生產則欲其多，分配則欲其均，纔是正理。中國今日可謂寡到極處了，提高人民的生產力，即是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即是提高人民的消費力，商品不愁不暢銷，市場不愁不推廣的。絕對的悲觀論者，請放心罷。以上所說，農業輕工業是如此，重工業在發達程序上自然較後。但是中國如果要興辦重工業，如鋼鐵廠等等，則歡迎投資，歡迎技術人才，是必然的。因之經濟提携，也是必然的。所以絕對的悲觀論者，以為經濟上若沒有同等的力量，則不能提携，這話是沒有根據。此於和平運動，關係極大，明白了經濟提携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便可明白和平運動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了。

以上所說，是「量力」不是「不量力」。我們不但應該擔任和平運動，我們並且能夠擔任和平運動，以努力於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並努力於實現。末了，還有幾句話，日本輿論，大體上都盼望中國能有愛國者出來擔任和平運動，這是重視中國民族意識之表示，我們十分感謝。但是還有一小部份責備中國，不應只知愛國，應知興亞尤大於建國。我想答覆道：日本人如不愛日本能愛東亞麼？然則中國人如不愛中國，又安能愛東亞？至於中國人呢，應該記著孟子所說，不要『自暴自棄』，尤應該記著韓文公所說，不要成爲一個『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人。那麼，於創鉅痛深之後，同心協力，必能將建國興亞兩重責任，擔負起來。

特載 從大處着眼 從小處着手

周佛海

我執筆做這篇文章的時候，想起了去年的今天。因為去年的今天，我追隨汪先生離開昆明，飛往河內，現在恰恰一年了。今天回憶起來，真不勝感慨萬端。

當時同乘飛機的，是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鳴陶希聖和我五人。下午二時龍雲親自送我們到飛機場，二時半起飛，我們就此離開現實，另去開拓新天地，另去創造新生命了。

在這一年之中，我們歷盡了千辛萬苦，雖然沒有多大的成績，但是和平的曙光，已漸漸的顯露；只要我們不灰心，不餒氣，以堅強的決心和毅力，勇往直前的做一下，我們的成功，一定是不遠的。

我覺得中日和平、中日提攜這種偉大的運動，已漸漸從第一期進入第二期了。我們的努力，也要適應着客觀的需要，改變我們的作風了。

第一期，是研究原理原則以樹立理想的時期；第二期，是根據理想改正不合理的事實以實現理想的時期。換句話說，第一期的工作，是從大處着眼，第二期的工作，是從小處下手。

一種偉大的政治運動，當然是不能沒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運動，是盲目的運動，是無意義的運動，而且根本就不會成爲運動。但是單只標榜一種理想，而不努力從事業方面去求其實現，這種運動，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一點一滴的

從各方面具體的事實着手，以求整個理想的實現，乃是非常必要的。

中日和平和中日提攜，當然是要有一種高尚的理想的。所謂和平，不僅停戰就算了事的；所謂提攜，也不是彼此臨時互相利用一下，就算成功的。中日兩國，一方面互相尊重獨立的立場，一方面同具一個共同的目標，雙方協力互助，向這個目標邁進。近衛宣言和汪先生的艷電，已奠定了中日和平的原則和中日提攜的理想。所以我們第一期的工作，已經大體完成；換句話說，從大處着眼的工作，已經大體完成。今後的工作，是如何使這種原則具體化，如何使這種理想現實化。而要具體化和現實化，就非從小處下手不可了。中國有句成語說，「欲行遠者必自邇，欲登高者必自卑」。中日提攜這個既遠且高的理想，我們要從近處和低處開始，一步一步的腳踏實地的做去。如果一方面懸一個高尚的理想，一方面又要我們遷就既成的事實，我想中日提攜的前途，是不容易順利的進行的。所以我說今後第二期的工作，是從小處下手。所謂從小處下手，就是要改變，而且要迅速改變不合理的既成事實。把許多不合理的既成事實改變之後，纔能掃清中日提攜的一切障礙。我希望中日雙方的同志，今後要集中全力，去改正不合理的事實。這便是我於今年元旦貢獻給中日雙方的同志的一點意見。

特 載 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陳 公 博

198

自從去年汪先生發表駁電主張，到現在整整一年。中日和平運動慢慢展開，而我則日夕不息的在那裏想：如何纔可結束中日的戰事？如何纔可使中日永久和平？因為這不單純是原則問題，而要提出具體辦法的時候了。

實在說，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雖然沒有主張過戰，我却沒有主張過和。因為我總覺得中日之間，橫着有不可解的怨恨，而兩方都抱有不可解的敵意。這種怨恨和敵意一天不能消除，暫時的和局，是不能挽救未來的危機。因此我曾費了很長的時日，去探討怨恨的來源和敵意的癥結。

我很覺得奇怪：日本和歐美對於中國同是一個外國人，但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比碰到一個歐美

美地方，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格外容易了解，格外容易作朋友。可是我會覺得奇怪：這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分手之後，便在背後，互相敵對，互相蔑視。

我不知自己對不對，我以為這種敵對和蔑視，實在基於內心的嫉妬。在中國這一方面，以為中日好像兄弟一樣，在日本沒有維新之前，中日的命運也正相同。可是日本強了；中東之役，中國是失敗了，日俄之戰，日本又戰勝了。不但如此，日本且模仿歐洲帝國主義的方式和辦法向中國侵略和壓迫了。好像兩兄弟，以前都是捱受慘苦的命運，現在一個是強了，一個是弱了，這個強的不得不援助弱的兄弟，而且加緊和外人向這個弱的兄弟壓迫。這個弱的兄弟怨恨強的兄弟，自然比怨恨一般外人更深刻。不

過日本之強，中國知道沒有方法可以遏抑的，於是把怨恨都寄託於蔑視；以為日本雖然強，她的文化是由中國去的，中國既是日本文化的泉源，無論日本怎樣強盛，我還是一個老大哥，你儘管強，我儘管瞧你不起。

至於日本方面在維新之後，國力未充，其勢不能和歐洲的帝國主義爭雄，也只有向中國下手；以為中國老大了，腐化了，很有種「天與不取實受其殃」的神氣。不過在內心一想，日本文化雖然不是全部來自中國，至少若干文化是孕育於中國，於是她極力模仿歐美，極力想忘記她的兄弟國家，好像強的兄弟，以不認他的弱的兄弟為榮，以為一個強人有了弱的兄弟，是喪失他的身份和體面。不但要忘記他的兄弟，反而更壓迫他的兄弟，以為這樣纔能表示出他有資格和

歐美齊觀，而非和中國等量。

他們彼此都具有內心的嫉妬，不特不設法互相了解，而且故意的不求去了解。就是中國人方面的所謂日本通，而日本方面的所謂中國通，也都本着互相蔑視的心理，相互的偵察而不試求相互的了解。日本通得到日本的結論，就是「日本人不可靠」；而中國通所得到的中國的結論，就是「中國人容易欺負」。憑着這種內心的嫉妬，已足打仗而有餘。所以我常說，縱使沒有蘆溝橋事變，縱使沒有九一八事變，中日兩國始終要打一次大仗，非大家淪入血海不可。這種慘運似非憑少數有識之士在短促時間所能挽回，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為歷史上無可避免的悲運。

現在中日兩國已戰爭了兩年多了，雙方同蒙重大的犧牲。日本方面已經有根本的覺悟，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從前以為中國可以不戰而屈

是錯了，一戰而可使中國瓦解也錯了。中國方面也有了根本的覺悟，從前以為相鬥下去日本經濟必定崩潰是錯了，中日戰爭可以惹起日本的革命也錯了。兩方已經覺悟到，中國沒有最後勝利的把握，而日本也不能滅亡中國。兩方更同時感覺筋疲力盡，內心的嫉妬也在戰爭中彼此認識而消除。這時是中日兩國棄嫌修好的時機，也是中日兩國翻然締結永久和平的運會。

但是中日怎樣才能永久和平呢？我想了一年，並不是原則的問題，而是具體辦法的問題。田為和平的原則早在近衛首相的聲明和汪先生的豔電主張之中確立，而所謂具體辦法，實質言之，就是媾和的條件怎樣纔使中國依然保持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

目前雖然和平運動正在擴展，所謂具體條件或者離決定的時機還遠，

但我不能不提出幾點主張，希望雙方加以注意。

第一，中國所要求的是獨立自由，換言之，是國家的主權和行政完整。我讀過許多日本的雜誌和朝野的言論，他們很了解中國的獨立自由，不只於中國有利，於日本有利，而且於東亞更有利。但言論終是言論，我希望雙方將來能夠根據這個原則來討論和平條件，凡任何事實足以妨害中國的獨立自由的，應該下絕大的決心把它去消滅。

第二，中國所要求的是統一，凡含有分裂意味的行動和設置，都是違反中國的歷史，違反中國的國情，違反中國的利益。我們也知道在戰爭之中，免不了為軍事的便利，形成地方政權的臨時設置；但這是一時的，或者是不不得已的，倘在和平之後依然支持這些地方分裂，中國必不會安定，

而會形成中國的長期變亂。結果中日得不到永久的和平，結果還是一個草草和議的暫局，因此我希望雙方於討論和平條件時，把一切「特殊化」的事實，一概刪削。

第三，中國所要求的是立刻實現的事實。我曾見過日本有識之士的言論，都一致確認中國應該獨立自由是最高原則，不成問題，然因軍事發生的既成事實，在不得已之下，不妨暫令繼續，以後使之逐漸改正，以期符合最高的原則。但是最近歷史曾告訴我們，這種希望完全是理想，是很難實現的。我還記得威爾遜在巴黎和會為一般歐洲的現實政治家所撓阻，他對於既成事實都讓步了，但有一點不肯讓步，那就是國際聯盟。他以為國際聯盟一旦成立，凡爾賽條約總有一天得到合理修正的機會。可是凡爾賽條約是簽定了，國際聯盟是成立了，

二十年中凡爾賽條約未曾修改過一個字，終於引起這次歐洲再度的大戰。我們鑒這已往，愧於將來，深不願徒然定有空洞的原則，而繼續許多既成事實。

第四，中國所要求的是日本信賴中國。日本有識之士曾三番五次的說，中日和平是需要互相信賴的，這話確是對的。但是我們固然不希望日本以戰勝國自居，然而日本到底是軍事勝利者。現在沿海是受日本控制了，中國許多省份被日本佔領了，日本目前要中國信賴日本，倒不如日本先信賴中國；換一句話，日本應該大大方方的給予中國以最好的和平條件，不特昭示中國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意，并且也無控制中國之心。這樣事實具在，互信必生，中日的百年大計，也可立時大定。

中國具體的要求，本不是今天一

紙短文所能詳寫的。末了我還希望日本應該了解這次中日和平，日本是和中華民族媾和，而不是單純和汪先生媾和。中國最需要是和平，汪先生纔本着國民的需要和期望，不避艱難，不避犧牲來領導這個運動。日本所提的條件，中國國民能接受的汪先生纔能接受，中國國民不能接受的，汪先生也決不能接受。我希望兩國人士本着悲天憫人之懷，商討東亞的百年大計，而不希望兩國人士本着外交形式，作討價還價的和議。

中國四萬萬的人民正期待着合乎正義的和平條件。中日兩國人士應該認識自己的責任，日本人應該替中國着想，中國人也應該替日本着想，同時兩方還應該替東亞着想。若兩方牽於現實，沒有最高的理想作根據，我們不特不能解決這次中日事變，或者更種下了未來的無窮事變。

和平興亞與和平建國(上)

原勝
仲平譯著

——譯自日本評論一月號——

汪兆銘氏的中央政權之組織，雖可說是事變處理的第一步，但是否可以說是興亞的第一步呢？關於此點，日本方面還缺乏積極性。同時，在汪派，他的中央政權之組織，雖可實踐其建國的第一步，但能否保障其興亞的第一步，關於此點，也還缺乏明白性。

中日事變現在已達於政治的階段，鬥爭行為已向着那為追求政治的目的而展開了。所謂「中日事變達於政治的階段」一語，它的意義，就是中日兩國在共同追求和平。和平，連在高唱徹底的抗日焦土戰爭的蔣政府中，如外交部長王寵惠，中央黨部秘書長朱家驊輩，也公然議論中日和平問題了。不用說，自汪兆銘氏及其同志以汪氏之脫離重慶為契機而從事和平救國運動以來，日本政府方面，所有近衛內閣及其後的歷屆內閣，對於汪派的運動，總是積極支持的。所以說，新中國的中央政權之組織，是中日兩國追求和平的一個政治的階段。

但是，關於新中央政權之組織及其地位，因為日本方面與汪派方面的發足點之不同，及立場之不明確，致使兩方面對於和平的認識，也就形成未能一致的狀態。

從中日事變的意義及其目的論究起來，在日本，和平是興亞的前提上所不缺的政治條件。

日本處於目下世界的破局及其動亂之際，要想把東亞遭受歐美白色人種（雖屬不當但已經過二世紀以上的）支配的歷史，加以革命的修正，把東亞從屈辱的奴隸地位解放出來，這個機會是不可放逝的。為要達到這目的，必須收拾目下的中日戰局，置東亞於和平狀態，使東亞達到為東亞的行動而行動的內在的結合。

這裏面，便有「和平興亞」的意義存在。從而，中國之建國，對於日本，便成為「興亞不得忽視中國之建國」這個嚴峻的真理，也就成為現實政治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方面，就中國而言，和平是建國的絕對的前提條件；中國是已進入修正「抗戰建國」之錯誤，改為「和平建國」的階段了。不過，中國之建國，若是否定與日本採取協同的興亞立場，是不能成就的。若是切斷與日本的緊密的相互關係，放棄興亞，則中國所能成就的建國，除了像蔣介石的亡國的焦土建國之外，恐怕不會發見什麼。

日本及汪派，一方面追求中日間的和平，一方面，在

日本，若不顧念與亞，只把重點置於事變之處理，在汪派，若把與亞推出遙遠的距離，只把力點置於建國，那末汪派的新中央政權組織之後的中日政局，必將逆轉混亂，兩國又要離開和平而反目嫉視，結果仍不免衝突之再來。

由此可知，在中日和平問題的中心上，帶有一個極重要的性質，就是與亞與建國的思想的交流及政治的聯繫。

日本若以為事變之處理是包括了中日和平的一切，則此種和平，純然是媾和的一種變形。從而，日本必將提出十足戰勝國的性格的媾和條件；可是，單單爲了締結媾和的話，汪兆銘是不會出來的。汪氏決不是以戰敗國的責任者的身份而登場，他是要與日本共同確立中日和平，是一種政治行動主義，要想把垂亡的祖國重新建設起來的。換句話說，汪派方面，所謂和平，在原則上不是媾和，乃是建國的一個手段。當然這種和平，若不打倒現在仍在強調對日焦土抗戰的蔣介石重慶政府，是不能夠成功的；故在汪派，和平又是一種變形的革命行爲。

在和平問題上，日本與汪派之間的認識之相遠，是一絕大危機。要解決這種對立的危險，在日本，必須以中國建國爲和平與亞之前提，在汪派，必須以和平建國爲和平與亞之先驅。

▲與亞與建國的意識形態(Ideologie)上的問題

和平與亞與和平建國的思想的交流及政治的聯繫性之缺乏，根本的原因，是由於與亞與建國的意識形態上的一致。

在日本，是中日和平確立之後，用何種意識形態來保障并指導國家的生活與發展？這個問題尚未解決。

元來，綿互三十個月以上的戰鬥行爲，已經客觀的把日本在從來的意識形態之上所組成的經濟關係及政治機構予以變形了。這個變形了的經濟關係及政治機構的再建，其途徑如何，實爲支配日本將來命運的重大關鍵。

在日本的政治責任者之中，也還有遵奉舊的意識形態以指導戰時的以至戰後的日本的。他們所持的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所持的意識形態，一點也未加變革；實在說，他們是以日本在大戰後所獲得的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論爲基礎的。他們以世界第一次大戰爲境界線，認爲日本沒有變更國家的意識形態之必要，也可達成國家的發展。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的資本主義的體制，雖在戰後，亦未改變，只是在它的矛盾的調整之下，保障某種約束的繁榮而已。若是僅僅觀察這一小段的歷史條件，他們的認識，也算是正確的。然而，今日之世界，並不是企圖資本主義的體制之調整，而是創造在其破產之後的新體制啊！

社會主義的蘇聯之出現，全能主義的德義之登場，世界上憑空來了驚人的破壞力，建築在英美法的民主主義的

意識形態之上的資本主義體制是被突破了。這就是說，世界已到了轉換期的激變過程。所以，我們也必須拿新的歷史觀與新的世界觀來處理中日事變，來解東亞的諸問題，來決定國家的生存及其發展的途徑。日本縱然主觀的不肯放棄舊的意識形態，客觀的也會有異常的歷史重壓來強制它的。

日本對於現時的世界動亂，若是仍舊照過去的經驗，只想獲得一種機會，使日本由自由主義的貿易來追求國家的發展；因而不惜把中日戰局無意義的結束，以為總可以得到相當的補償。我可以斷言，由這樣所得的結果，即在主觀上也是失望的。在峻烈的現實之前，這種舊意識形態，我敢嚴肅宣告其必歸敗北。

日本雖然想追求自由貿易，無奈世界市場已被分割為封鎖的經濟同盟圈了；而其封鎖性，正因為世界在戰爭的渦流之中，更見增強起來；從而，為自由貿易之根基的生產資源之供給，也都陷於枯竭的境狀。一方面，假定中日之間的戰鬥行為能夠終止，而英美蘇——尤其是因為歐洲戰爭而國際地位特別增强的美蘇兩國，對於日本的發言及其地位，將使日本被困於一刻也不能放棄強化并擴大國防的逐鹿之路，然而，日本在對華休戰之後，為謀軍需工業之生產擴充，必需尋求軍需資源；可是，目前海外市場的軍需資源，交戰狀態的諸國或受其影響的各國，她們是絕對不會放手給日本的。同時，英美法德義諸國，為爭取其確

保戰爭勝利的資源供給同盟範圍，勢必又要以中國為始，發動橫互於東亞全體的殖民地再分割之戰爭。

在這樣的世界狂潮之中，日本還是因襲舊來的意識形態，其不能發揮其解決國家諸問題的能力，自不待言。其實，世界本身也已在否定其舊意識形態之存在而加以摧毀了。所以，日本為事變處理也好，為和平興亞也好，皆有利腳於新意識形態之上之必要。日本應當把在新意識形態之下奮鬥的革新政治勢力結合起來，把它作為事變處理的主體，進而成為指導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原動力。

「東亞協同體」「東亞聯盟」以及其他種種論說，現在有如春筍之怒發，可以說是已經到了各種意識形態的氾濫狀態；可是，在政治指導層，依然被那種回到自由主義的舊意識形態的意念所支配。我們感覺到，反對舊意識形態之還元，同時，促成新意識形態之創造與統一，及其政治指導，乃是目今日本國民的使命。

汪派的以建國為目標的政治行動，是依據於統一的意識形態。不過，這乃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從未有過出入一步的變更。就反映在意識形態上的汪派的性格看去，它的政治行動，還未有何等東亞的規模或世界的新關聯性，只形成一種表裏並不相稱的關係。例如汪派所說的「戰必敗，和必興」的和平建國論，強烈地呈顯一種國家功利性，就是為此。

中國的世界地位，是半殖民地。在其國家的發展階段上，現在依然是由於封建的殘滓而使國家的進展多少受了約制，只不過進展到民族主義的近代國家建設之政治的初期時代。汪派以為中國要建設為近代國家，在政治、經濟、教育、技術等諸種分野上，非竭力吸收民主政治的文明要素不可。他們爲了這種國家的要求，便把他們的建國運動以公式主義的階段論而展開了。可是，目前的世界是已到了民主政治文明破產的局境，以這種民主政治來做建國的意識形態，不是流於機械主義者的立場了嗎？

中國建國的內容，要就其國家的階段來決定，那是當然的；但其內容，同時要顧到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利用世界的激變，以推行革命的變革。即是說，中國的進展，不宜墨守通常國家的歷史的階段，際此轉換期的世界潮流及新時代之出現，要把國家的意識形態納入新的境界纔是。汪派的建國的意識形態——即其政治上的行動規程的意識形態，不是那種僅把政策加以變更的修正三民主義所得盡其能的；處此世界新時代，非有一種足以澈底達成建國的新三民主義不可。

現時，汪派的建國政治，與日本的外交政策，對於某種規定部分，是立於抗爭的地位的。在他們對立的分野上，我們發見，他們對於日本的大陸行動，是以未然的功利主義爲準據而表現在商業及產業的分野上面；這就是汪派的行動原則的意識形態吧？

總之，汪派若不把三民主義從舊套的民主政治脫離出來，無論是現在或是將來，總不免有困難問題之發生。

汪派若不從新史觀與新世界觀，僅拿舊政策與舊主義，要想達成建國，這樣的政治鬥爭，徒然造成一幕賭博生命的悲壯事蹟而已，是不會發生什麼真實的力量。至少，汪派的建國運動，若是缺乏東亞的理想及世的新聯繫，決不能喚起世界的強烈的共感。

汪派的建國運動，想必是具有孫文氏的所謂大亞洲主義的東亞理想的；但是，這種大亞洲主義，對於亞洲各國，採取何種政治體制？採取何種經濟關係？還有，這種大亞洲主義與世界新秩序及新文明，具有何種聯繫性？這些問題，孫文氏並未說明，汪派亦未加解答。所以，新中國的建國論者，現在更要負起解決孫文氏的大亞洲主義的責任。但是他們有的說：中國目前只有如何從戰爭的慘禍之中挽救出來以建國，纔是國家的緊急課題，至於討論東亞的理想及討論世界的新時代，現時的中國還沒有這種資格，也還沒有這樣的能力。不錯，目前的中國，關於民族國家的建設問題，確是足以左右國家運命的緊要問題。然而，以爲建國問題可以包括中國問題的一切，以爲中國之建國無需具備東亞的理想及世界的規模，可有這種理由嗎？相反的，在理論上，中國苟不具有東亞的理想及世界的規模，則其建國必難獲得成功，那倒可以斷言哩！

未完！

從開放長江說到日美調整邦交之途徑

鎮南

日本外務省及在華海陸駐軍當局於上月十八日分別宣布：「準備開放南京下游的長江航禁」。一月以來，沈悶已久的遠東形勢，便又呈現活躍。

無疑的，日本此舉，最大目的在於示好美國，藉以開闢日美商務談判的有利途徑。日本宣布此項意旨之後，美國首先表示好感，商務談判隨即在日京與美京兩地同時開始舉行；且在正式談判尚未具體進展之先，美大使格魯便向日外相野村提供保證，謂「美國於下月美日商約期滿後，仍將維持美日貿易關係」。同時，美政府並訓令格魯大使，向日本表明美國政府並有進而調處中日糾紛之意願。

英法方面，也有與美國同樣的反應。英國當局對於日本開放長江之音旨，表示極大欣慰；同時，續開東京英日談判，及解除天津封鎖兩事，亦傳說甚盛。其在法國，當法大使向日外相探詢開放長江的實際狀況時，除表示歡迎的意念之外，並鄭重否認法國援助蔣政權的傳聞；同時，法日兩國之十年懸案，亦適於此時全部解決，並有進一步訂立日法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

從上述的事態發展情形看來，可知英美法三國的對日態度已經明朗化了。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在遠東，實際保有權益且亦實際具有決定能力的外來國家，是英美法三國。在目前的國際狀況之下，英法兩國無力顧及遠東，故此時足以左右遠東問題的，惟有美國一國。日本之所以特別對美示好，其放在此。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

來，日本此次拿開放長江來引致日美商務談判，其最後目的自不限於日美兩國間的商務，她是更想由美日兩國整個國交之調整，進而謀中日問題之解決。

本來，遠東問題的重點是在中國，而在目前來講，遠東問題實在就是中國問題。無論日美商務談判，日英東京談判，或日法互助談判，皆可包括在中國問題之內。她們所談的既是中國問題，則中國在她們之間的地位，其重要可知。然而，當她們談判的時候，無論是美國、英國、法國或日本，都不把中國列為決定者之一，而把中國作為她們的討價還價的對象。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提出來抗議，尤其要向日本抗議。

中國在遠東任何談判中，必須居於決定者之一的地位，談判的成就才可算真的成就。這不止中國為要爭取國家的平等地位應該如此，即就日美英法四國本身利害而言，也惟有如此纔能獲得充分而公平的滿足。現在且就日美兩國來說：自從美國宣布廢止日美商約以來，日美關係，日趨惡化。惡化的結果，對日本固有極大之不利，對美國，為害亦屬不小。所以日美兩國都在企求兩國新關係之確定，而最近的兩國之接近，實為此種企望的初步表現。但要知道，日美兩國單憑兩國間的私相授受，或各自利用其他不正當的國家以為手段，是絕對做不到日美新關係之確定的。照現在情形而言，確定日美關係的途徑不外兩條：

一是由美國運用日美蘇的三角關係，以確定日美關係；

簡言之，就是美國利用美蘇妥協以對抗日本迫使日本就範。一是由日本運用中日美的三角關係，以確定日美關係；簡言之，就是日本從速與中國作成和平，則美國也就不會對日遷就。

試看這兩個途徑的利弊如何：

第一個途徑，美國利用美蘇妥協以抗日本，不說不是現時的美蘇關係所能做到，即說能做到幾分，若日本不肯屈服，美國勢必要對日作戰。但是，美國要想對日作戰，必須通過英法，纔能取得太平洋中的重要軍事據點，這一層，在目前是難以辦到的。拿英國來說，英國不願意美國取代她的太平洋上的地位，是和不願意日本稱霸太平洋一樣的。即使英國願意美國戰勝日本，她也不願意在與自己無利的戰爭中把她所有在遠東的現實權益隨戰爭而毀滅。其次，關於美國利用蘇聯一點，現在固不可能，將來亦未必有效。因為日蘇關係雖然是虛偽的，可是也還未到決裂的地步；將來美國向蘇聯勾結時，誰敢料定日本不也向蘇聯勾結？如此一來，日美關係尙未決定，倒是雙方都被險成性的蘇聯反利用去了。所以，我們可以斷言，此一途徑必然不通。退而言之，即說美蘇妥協可成，英法也可協助美國作戰，並且是美國戰勝日本；由這種結局而確定的日美關係，若日本不亡，則將來必再有報復之日，試問美國最後所得的又是什麼呢？

第一途徑不通，當然只有第二途徑，也惟有第二途徑纔是合理的有利的途徑。因為日本努力作成中日和平之後，中國在下等的和平之下，是感激日本的；因感激日本而傾心援助日本，自屬必然。所謂中國援助日本，並不是說由中國派兵去對抗美國，中國固無此力量，亦無須如此。只要中國對

日本以最惠國的條款締訂各種互助條約，以打定中日兩國最結實的基礎；中日兩國的礎基一經鞏固確定，便不愁第三國之侵犯。同時，如前所述，中國問題就是遠東問題，中日問題之解決，也就是日本自己解決了遠東問題。美國可以讓中日問題延宕下去，她是不肯讓這樣一個遠東問題未經她參加便解決的。我們可以預料，中日和平談判正式實行之日，即是美國對日態度好轉之時。不僅美國，英法甚至蘇聯也都如此。事實上，最近美英法諸國對日態度之轉變，並非純然由於日本宣布開放長江意旨，在此以前，即已有此趨勢，長江開放之宣布，不過是一個門檻而已。否則，長江下游一小段之開放，殊無關遠東問題之大體，尤其與美國的關係更小；倘是美日英日之間並無默契，日本固未必貿然出此，英美各國亦未必貿然採取樂觀。此種趨勢，實在是一年來的中日兩國的和平運動所造成的。此為日本所不可不知。

此一途徑，對於美國亦無不利。美國因中日和平實現而不得不對日妥協，說起來好像是美國居於下風了，其實不然。要解決遠東問題，只有由日本、中國、美國以及英法，皆立於相互平等之地位，纔能收得平等而且永遠和好的結果。美國一向是以公正風度聞於世的，固不願意自身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當亦不願意令他人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在中日和平的現實情況中，中國原來沒有屈使美國或其他國家於不平等的意志與能力，日本也沒有這種意志，說日本要屈使美國於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這在日本數番聲明「解決中國問題并不妨害第三國的正常權益」的態度上，可以證明。

綜上所述，可知由中日和平來引致遠東各國關係之調整，不僅合於中日的需要，抑且合於各國的需要。

論列強對日重開談判

Guenther Stein著
劉錫譯

The China Quarterly

最近西方數大強國，與日本重開外

交談判，頗使華方人士感覺不安。尤以

英國之欲與日本重開談判，解決英日間之懸案，更引起華人之疑懼。雖然英國權威方面一再宣稱，謂英國之遠東政策並未變更，然華人之疑懼心理，並不因而稍釋。再者據聞法國亦欲與日本改善邦交，俾使法屬印度支那，于歐戰期間，不致遭受任何危險。華方人士對於此點，亦感不安。即日美間之談判，中國亦異常注意，深恐日美之諒解，或于中國不利。再者對於日蘇間之談判，華方人士亦不能謂毫無疑懼心理，蓋中國亦恐日蘇談判結果，會使中國利益蒙受損害。就是這般在遠東擁有利益之西方人

士，對於上述諸國欲與日本改進關係一事，亦殊為詫異。再者目下正於東京所進行之談判的結果，或許對於歐洲局勢

，亦頗有影響。

列強與日本談判，其最近的目的似有三項：一，使中日戰爭期間彼等在華權益所受之損害，獲一滿意的解決；二，保護彼等在華權益，務期今後不再遭受侵害；三，與日本建立正常關係。

談判開始時，行將討論的問題，均載於各國之「細單」之中，所謂「細單」者，乃美國駐東京大使之言，即歷次抗議之總目錄也。這些事件均已久待解決。三大民主國「細單」中所關涉的事項，大致如下：

1. 日軍對於該三國所加的侮辱，傷害及生命之死亡。
2. 財產之損害及沒收。
3. 該三國國民在華之貿易企業與合法行動所受之種種限制。
4. 教會方面所遭受之阻擾，恐怖以及

強迫關閉等事。

5. 佔領區內日方所鼓動之排外運動。

然而列強並不祇以討論過去不幸事件並謀補救辦法為止，尤重要者，在設法使日本停止目下侵害外人權益之行為，對於將來，亦應使其給予滿意之保證。所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項，乃為日下談判之主要問題。過去，列強曾經提出抗議之事項，已數百起，此次重行提出討論時，則此項問題，將會自然而然的產生出來的。

顯然的，列強不會一定強迫日本，對於每一事項，均給彼等以百分之百的滿足，亦不會要求日本，使彼等在華權益，恢復戰前的狀態。並且亦似乎不會要求日本重新確定彼等一切在華所應享受之次要的條約利權。

英美法在最近的過去曾對日本作過小小的讓步；假如對於維持彼等遠東舊有地位極關重要的問題，若能獲得滿意的解決，則彼等對於某些次要的問題，或可對日本作更大的讓步。日本亦表示着很希望欲與這些國家，改進邦交。因為彼已深感其國際地之孤立，國內之弱

點增多，及對華問題之困難與日俱增。

日本欲謀補救過去的種種冤情，亦並不困難，因為各國所要求日本的各项補償，在外交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定可設法使其減少。然另一方面，日本對於在華佔領區內的外人權益之待遇問題，是不願給予任何具體的保證的。他情願如過去一樣，對於外人利益，作種種空泛的諾言，而決不準備提供具體的保證，或預先以實際的行動，表示其諾言之可靠。如開放揚子江一事，至今仍未見實行。因為西方列強所認為可以要求保證的，在東京看來，與其對華的固定政策不合，且與其「東亞新秩序」相違背。

日本過去雖一再中言尊重外人權益，但其目的在和緩外人的憤怒，若真是要他尊重外人權益，則東京將認為是不可能的。將來正式談判時，便可以看出：真正的尊重外人權益，與日本的「東亞新秩序」，是勢難並立的；並且在將來正式談判中，更可顯出，所謂日本與列強在華有合作的可能云云，祇不過是東京的一種空言而已。

日本之所以不欲與列強舉行坦白而

澈底的談判，其原因即在此。然日本却有心與列強改進關係。所以他便採取其一向所應用的延宕政策。日本政府不承認目下的談話有試探性質，可為將來正式談判的準備。日本外務省亦煞費苦心，藉報端向世界解釋，謂目下所進行之談話，乃完全非正式之談話，純屬例行公事，並無絲毫其他性質。外務省更鄭重申明：謂日本對於此次談話並不負有任何義務。

日本採取延宕政策，還有其他原因，這種原因係由其國內的情勢而產生。日本國內各個不同的政策陣營，對於應否與列強中某一二個國家舉行談判一事，意見頗為紛歧。再者日本應向列強提出何種反要求，及作何種權宜的讓步，內部意見亦頗不一致。

其次，目下的日本政府，苦於缺乏權力；正因其軟弱無力，故遇事便較往昔更需取得外交部與海陸軍部間的商酌結果。日外相因深知外務省人員，關於政策問題意見極其紛歧，所以在外交行動方面，他盡可能的謹慎將事，竭力避免于犯錯誤。像數星期以前因對貿易省

問題而引起的那種貴族的叛變，在任何情況之下，務使不再發生。

再者日本對於有關中國問題之種種不可避免的磋商，欲延宕至汪精衛氏所領導之新中央政府成為既成事實時為止。這表示日本想叫列強與汪精衛氏去解決各種問題。日本將宣稱中國的新政權是獨立的，所以非日本之力可以左右，故列強應與當地合法政權，直接談判。

日本雖然採取延宕政策，然她仍計劃向列強提出種種反要求。日本之反要求，可分三項。

1. 要求列強正式承認其佔領區內戰爭狀態之存在。列強若承認此點，日本則可繼續干涉外人在華權益，縱至將來亦可無懼外人之指摘。並且日本更可根據此點，更進一步的要求列強承認那些以軍事上的需要為藉口而實行的種種排外行動，為合法行為。

2. 要求列強承認建立「東亞新秩序」，為日本之使命。這也就是變相的承認日本的作戰目的。列強若承認此點，縱至他日和平時期，日本仍可

干涉外人在華權益。蓋日人祇要認爲因嚴格尊重外人權益而反危及其新秩序之正常進展時，隨時可以此點爲根據，採取排外的措施，且可根據此點拒絕外人所提出之抗議。

3. 要求列強停止對蔣介石之國民政府作直接或間接之援助。並希望列強自留餘地，俾他日可與新政府合作，藉以保護其在華權益。

除上述三項外，日本尙有其他種種要求。如要求英法放棄天津上海之條約權利；要求美國與之訂立滿意的新商業航運條約，以代替一九一一年所簽訂的日美商約（案此約已由美國廢止，作爲對日在華行動之報復）。

列強爲何欲於現在對日重開談判？案最近中日戰爭之膠着狀態中，並無任何變化，足以促使列強採取此項行動。

東京目下之外交活動，主要的似乎是歐戰的結果。日本對於英美法以及蘇聯，可以與之爲友，亦可與之爲敵。故上述諸國，竭力設法與日本建立良好關係。列強各自圖謀與日本成立諒解，可以說是業已變化的世界綜錯局勢之一種

自然的反應。但爲何列強不向日本提出交換的條件，而均各自向之提出己方的要求呢？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簡單：即一般人均認日本之國內及國際地位，因歐戰爆發而驟見削弱，現正遭遇困難，祇需與之爲友，對於各種懸案，便可覓獲滿意的解決。對於此項談判中列強對日讓步，感覺大惑不解的人，應記着此點。

歐戰爆發後最初兩個半月中之各種反應，實於日本不利。日本那不穩定而行將崩潰的戰時經濟，因世界市場中之各種重要原料，價格高漲，供給減少，確曾受到一個重大的打擊。

日本的那種想趁歐洲紛亂之際以收漁人之利的幻想，暫時均被打消。日本的工業，因受兩年來之戰事影響，力量大見削弱，且發生混亂，故無法增加出品，以供交戰國之需要。美國會廢止禁運軍火禁令，使將來日美商約廢止問題，對日本更見嚴重。因美國之工業，均忙於製造歐洲交戰國所定之貨物，故對日禁運軍火一事，國內的反對，即可消失，因而美政府可自由對日採取強硬行

動。

蘇聯因與德國訂立條約，其政治與軍事力量大見增加，彼可在東方運用較往時更大的力量。

至於中國的抵抗日本的力量，是否因國際局勢之發展而削弱，似乎仍是一個疑問。誠然，德國的對華之物質供給，業已終止，英法的供給似見減少，但這些損失，均似乎已因蘇聯之援助增加而獲得補償了。

列強與日本間之談判，其前途如何呢？這一點仍如前面我說的一樣，即日本不能保證列強在華之權益。尤爲顯然者，即日本因歐戰關係，其國內及國際地位大見削弱，故完全不得利用歐洲糾紛所給予的外交機會，謀獲任何利益。

但此外還有一個因素，可影響日本與西方諸國談判中之地位。此一因素即爲蘇聯。日本似乎希望英美法與蘇聯間之猜忌和敵對逐漸增加，以爲日本之利。這種有利的形勢，在東京看來，有兩種方式：

(一) 民主國需要日本之援助，對抗蘇聯。因民主國深恐布爾希維克，在歐

戰期間，逐漸變成對民主國的一個危險，或且尤甚於納粹。列強也許會料到在納粹毀滅之前後，彼等有與布爾希維克發生衝突之可能。到那時，日本便可希望列強忘却其在華侵害外人權益之種種罪行，與日本互作讓步，俾獲日本之合作，以對抗蘇聯。

目下之歐戰，將來最後階段之形勢如何，現在有種種推測，其中有一種推測：可以解釋上述的東京之理想，即日本將來有一天或可與英法及美國成立同盟。同盟國或將由西伯利亞進攻蘇聯，並攻擊那時已被蘇聯滅亡的歐洲國家，如此日本便可佔領三海濱諸省，作為其戰利品，並同時宣佈征服中國。

這種理論，若換句話說，即因民主國共同畏懼布爾希維克的關係，日本終有一天真能與民主國成立同盟。照理，日本的外交應該運用此項理論，但可異者，日本似乎還不會這樣做。

(二)另一方面，適得其反，即日本或與蘇聯合作，對抗民主諸國。關於這方面的機會，日本報端曾有論述。國民

新聞(該報時受陸軍部之示意)最近曾謂：『日蘇為世界兩大軍事強國，若彼此從事戰爭，毀滅雙方軍力，實屬大謬。吾人應利用目下機會，轉移蘇聯之外交注意，使其注意一項偉大之工作，即全盤推翻英國之世界勢力』。這一來，便會引起日蘇的接近問題。不過，日蘇聯也能和德蘇一樣，克服過去的仇恨麼？

就日本而論，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因日蘇曾在外蒙與滿洲邊境的蒙諾亨區域，發生過小規模的戰爭，那場戰事的結果，確深深的印在日本軍人之腦中，超過一般人之想像。

日本報知新聞上有一段言論，頗有意義，該報謂：『據軍事當局宣佈，蒙諾亨戰事結果，日方死傷一萬八千人。然就吾人觀之，雙方均無勝利之可言。蒙諾亨之戰事可謂無聊之至』。這段言論，可以說是日本之非常坦率的自認失敗，且表示日本希望此後勿再冒險，與蘇聯發生武裝衝突。但這並不能表示日蘇之接近，可超出解決懸案的範圍以外。至多也不過奠定了未來合作的基礎。

日本內部意見紛歧，絕不容其政府對蘇成立此類諒解。連不侵犯條約之訂立，亦不可能。所以日本與蘇聯所可解決的問題，祇限於邊界糾紛一類問題，故今後日蘇關係，仍保持時張時弛的局面。

英日關係之發展，似將與日蘇關係彷彿。祇要日蘇無實際合作的危險，英國沒有理由對日作極大的讓步。縱然英國欲與日本成立密切的諒解，日本因內部意見紛歧，亦恐礙難實現。英國深知中國之好感，對民主主義極其重要；如竟犧牲中國以討好日本，將影響英國他在遠東之地位。自然，英國今後仍將繼續與日本解決懸案，但無論如何英國絕不致犧牲中國主權，以謀對日讓步；尤因英國目下之國際地位頗好，無需採取危險行動，以結歡日本。

至於美國在目下談判中，其態度之堅決，是毫無疑問的。但日美的諒解，也不是不可能的。因為日美談判一經破裂，那隨之而來的經濟結果，不是日本所敢冒的危險。但在日美談判之中，讓步的國家，不是美國，而是日本。

日本在華之紡績資本

王時傑

中日大戰之「棉紡背景」，其重要性亦殊不弱其其他的各種經濟關係；所以有些人說今次的中日戰爭，係世界「棉紡資本戰爭之一幕」；試觀下列所集各項資料，此言實堪玩味。

據全國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民國二十五年度在華中日紡績勢力比較：紡錠，華商佔五七、七%，日商佔三七、六%；績線錠，華商佔三一、三%，日商達六七、四%；布機，華商僅四四、四%，日商達四七、七%。日商在華的勢力雖已不弱，但華商猶居優勢。有如下表：

	戰前在華中日紡績勢力比較	
	華商	日商
工廠數	九三	四〇
紡錠	二·八一三	一·八二六
績線錠	五七·七%	三七·六%
布機	七二	三一
增錠計劃	一五七	三三八
線錠	三一·三%	六七·四%
布機	二二	二四
同比率	四四·四%	四七·七%
職工數	一二九	六九
棉花消費	五·二三〇	三·四〇五
棉紗生產	一·四三八	五四八
棉布生產	三九五·〇〇〇	六三四
合計	一三六三	四·八三六
同比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增錠計劃	一〇三	五〇一
線錠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布機	五一	五一
同比率	(?)	(?)
職工數	二〇〇	二〇〇
棉花消費	八·一六八	八·一六八
棉紗生產	二·〇二五	二·〇二五
棉布生產	一·〇三六	一·〇三六

中國本為世界原棉的主要生產國家之一。一九三七年，

量界原棉總產量八·二九〇千公噸內，中國本部所產佔七十七萬公噸（一九三六年且達八十五萬公噸）；如將東四省年產量約十餘萬公噸合計，華棉產量實佔世界棉產總量十分之一左右（參看「世界農業年鑑」）。

據中華棉業統計會對於民二十五全國產棉之分省估計：

省別	棉田面積	產棉數量	省別	棉田面積	產棉數量
河北	一〇·四三一	二·五四〇	山西	二·〇七五	四四七
安徽	一·四〇四	五一六	河南	六·〇六八	一·三六七
山東	六·一一一	一·七九〇	陝西	四·二五五	九三八
江蘇	一〇·〇四一	二·四二六	浙江	一·七一八	八五三
江西	二·二七	四二	湖北	八·八八三	二·六六八
湖南	七三六	二五八	四川	三·九〇二	五七三
遼寧			合計	五六·二一一	四六八

(註) 棉田單位：千華畝；產量單位：千担。

是則我國主要棉產地，乃在所謂「華北」。據日方「北支經濟資料第九輯」統計：即冀、魯、晉三省之棉產，已佔全國棉產三分之一。

日本國內連朝鮮在內，每年的棉產尚不足五萬公噸，但其每年紡績廠所需之棉花，幾達八九十萬公噸之多。常年仰給海外輸入，特別仰給其假想敵之美國，更非得計；故戰前日方屢次鼓吹「日支經濟提携」，所提之第一項計劃，即「改進華北棉產」。自華北淪陷後，日本資本家最先向華北活動的，亦即「改良華北棉產」與紛紛設立紡績廠。與此相同，九

一八後淪陷之東四省，增產棉花亦為其主要工作之一。故近年來日華之一切糾紛，即謂「棉花作祟」，亦無不可。誠以日本棉產雖不豐，但其資本主義，乃以紡績而起家的。中國的棉產資源既豐；加以近年中國紡績又在激越發展；中國紡績業之成長，日本在華之紡績品市場自必為中國產品取而代。且因有豐富的原料，及較日工資更廉之勞動力，中國紡績品亦不難將日貨驅出世界市場之外。是以華北之棉產，在日本紡績資本家心目中，不僅有關其原料之得失，抑且有關其國家之榮枯生死問題。故日方對於「中日經濟合作」之原則，為始終維持「日本工業、中國農業」之經濟關係。中國固不甘斷送自己前程，與永遠淪為日本工業之附庸；日本自不許中國有「羽毛豐滿」之機會；故當中國近年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方在開展之今日，不得不以「先下手為強」，致觸發不幸之七七盧變，循而演成中日之全面大戰，真非偶然的事。

日本既先後佔領東四省及華中華北各地，乃即厲行其「棉花增產計劃」。在「滿洲」已推行其所謂「五年計劃」；在「華北」又有所謂「九年計劃」的實施。

當「滿洲」淪陷之初，日方曾有「二十年植棉計劃」之樹立。計劃植棉面積擴至三十萬町步，年產棉花達成一億五千萬斤之紀錄。及昭和十二年樹立「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對於植棉事業，亦改為「五年計劃」，另行樹立「新五年計劃」，其目標，希望植棉面積增至十八萬頃，收棉二億五千萬斤。主其事者似係「滿洲產業部」，並直轄「遼陽棉花試驗所」，「錦州農事試驗所」，「金州農事試驗所」三處，及棉種培植圃面積一百二十町步，採種圃八千六百四十町步。並指定「奉天」、「錦州」、「熱河」、「安東」四省為獎勵植棉區域。實行一切

設施，皆秉承「日本棉產協會」之意志。惟其一切費用，當由所謂「滿洲國」的「產業部」負擔吧了。故一九三七年度的棉花栽培費支出一百三十二萬餘元中，由日本棉花協會「補助」的僅有十二萬元。

增產的目的，全全供給日商得以廉價購佔其全部。故在一九三七年又公佈所謂「滿洲國棉花統制法」；規定「滿洲國」內所產之棉花，一律售予日商控制的「棉花公司」。

「棉花公司」係根據前述的「二十年計劃」而組織的，資本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總店設於「奉天」，在各地設立收買機關十六個，並直轄軋棉工廠四處。全「滿」棉花之流通與分配，今已完全操於該公司之手。棉農之辛勞，亦不得不在該公司規定價格下決定其代價。

棉產既被控制，紡績業則更在日方壟斷之中。現在在「滿」設立紡績廠，必先經日方間接之核准；所以目前在「滿」的紡績工廠，幾乎完全屬於日商的資本。或即所謂「日滿合資」的紗廠；純由土著資本者，竟不得其一。試觀全「滿」的紡績廠及其內容，有如下述：

在滿紡績廠及其資本與設備		紗錠		線錠		布機		資本系統	
內外棉紡	九三・一五二					一・一五二		內外紡績分廠	
滿洲棉紡	四九・五二〇			九六〇		八八〇		滿鐵及富士紡	
奉天紡織	五〇・八一六			八八八		七五〇		滿鐵關係「日滿合資」	
營口紡織	五五・七二八					一・七三〇			
滿洲紡織	七八・七〇〇			八・八〇八		一・〇四五		滿鐵及富士紡	
滿洲製織	三〇・九二〇			一六・二二四					
東棉紡織	五二・四〇〇								
奉泰紡織	四九・九八〇								
東洋紡織	一〇・〇〇〇								

(未完)

東洋紡績分廠

美貨暢銷對日本之影響

Eliot Janeway
木 軍 譯

—Asia Magazine—

當一九三八年，美國採取退讓政策的時候，美國的輿論，對於美國撤退一切有關日本軍事機構的活動之問題，曾有極熱烈的討論。全美人士，均一致承認：日本之侵略中國，美國是無法抵禦的。但那班反對撤消對日經濟援助的人們，却抱另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美國若退出日本市場，美國的經濟即無法繁榮。彼當筆者對於此項詭辯，曾有所評論，我曾指出一件事實，即一九三八年春，日本的出口，空前的旺盛，而美國的出口，却顯出極大的頹勢。我更指出：一九三七年美國貨品的銷路，在亞洲以及他處，非常暢盛，而此項繁榮並未獲日本絲毫之助力。彼時美國各工廠大有應接不暇之勢，而對於日本所定的貨物，因其數量微不足道，簡直置諸不理。但這一項論據，到了一九三八年，却無絲毫的力量了。因為到了一九三八年，情勢已完全改變，絕不能像一九三七年一樣，因為定貨非常擁擠之故，故於任何定貨單均可任意加以拒絕。

可是在歐戰開始的第一個月期間，情形較一九三七年尤甚，美國各工廠更供不應求，日本的定貨單，又被擱置在一邊了。日本一度是美國鋼鐵最大的顧主，而在歐戰開始的時候，美國鋼鐵出口完全停頓。國內顧主所購的鋼鐵竟達一百萬噸。直至這屯積的高潮過去以後，美國鋼鐵廠纔開始供應外國的顧主，但以受彼等重視的顧主為限。就連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

毛一波

十七 無產階級專政能消滅階級嗎？

共產黨自己常說他們的最後目的是在建設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而他們達到此目的的手段便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現在來看他們的手段能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馬克思承認「政權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他主張無產階級「去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他又主張「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的權勢也是要失掉的」。這種說法豈不是與共產黨同盟憲法第一條所說「本會宗旨是在推倒有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剷除基於階級鬥爭的舊社會，而建設無階級無私產制的新社會」是一樣的滑稽麼？無產階級既獲得政權，「占領權力階級地位」，怎麼又能「同時掃除一切階級的本身與階級對抗的理由」呢？更怎麼能「去掉勞動階級本身的權勢」呢？無產階級既是大權在握，又同時掃除一

英國政府購定鋼鐵之數量亦不能隨心所欲。至於日本更不必說了。再者銅的方面，其情形亦與鋼鐵無異。

至於機器以及機械工具等，在出口商未能購得之前，即銷售一空。就連國內最大的鋼鐵顧主，如美國政府等，定貨單寄去後，必須等待數月之久，纔或開始定製。美政府曾向美國卡車製造廠，訂購坦克車三百二十九輛，供陸軍之用，價值六百萬美金，但該卡車製造廠接到定貨單時，即通知美國政府，謂所定貨物，六個月後方可動工。

這種瘋狂的屯積的高潮，適值日本處境困難之時。因為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日本代替了蘇聯，成為美國機器最大的顧主。日本所購美國機器的總值，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是一三、二二七、二三〇元美金，而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已增至一四、七二三、八〇九元。滿洲國的工業化的計劃完全依賴美國的機器的供給，其購買美國機器的總值，由二三七、六九〇元美金，激增至一、四八六、七八六元。

日本的定貨單，目下雖被擱置一邊，但將來俟美國工廠稍閒時，仍將為之製造。

在歐戰開始第一月中，日本在美國市場異常活動。日本非常幸運，八月間購買價值一千二百一十萬零四千元美金之貨物，運回日本，九月間又購買價值一千九百三十萬零五千元美金之貨物，其數較一九三八年九月份日本所購美貨之價值略低。

日本本年九月中運回之貨物，均為今年上半年所定購者；至於本年九月份所定購的貨物，恐未能如數運回。

日本恐美貨價格上漲，將減低其購買力，故又將一批黃金，約值五百萬元美金運至舊金山，一俟機會得宜，即將這宗黃金變為貨物。

美國這種繁榮，對於日本簡直等於經濟制裁，而這種制裁是自勵

切階級的本身，則世界上只有獲得政權的一個階級存在，那麼又要這個「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何用？且馬氏既承認政權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那麼政權在一日，階級對抗的事實亦存在一日，階級對抗的理由也不能「掃除」！且無產階級費盡精力來奪政權，一旦爭到手了，又「同時去掃除自身的權勢」，能乎不能？

消滅階級的區別是對的，但是馬克思主張要等無產階級先掌握政權，然後纔由他來消滅階級的區別，只是自欺欺人的話。他自己既說政權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權力，那麼，要用這種權力來消滅階級的區別，真是夢想！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因為有階級的對抗而存在的。

關於這一點，巴枯寧說得好：「假若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那麼他對誰實行統治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倘有其他無產階級服從這個無統治者與新國家……」，這是不錯的，無產階級大權在握，便可為所欲為，一切生產機關都收歸國有，土地私有權也廢止了，那麼無產階級一變而為新有產階級，無產階級便會成了新支配階級（其實只有那幾個掌握政權自命為無產階級的黨派的領袖）。這樣反覆循環下去，階級鬥爭定

的澈底的，所以日本對之，恐懼萬份，一如深恐美政府正式宣佈禁止對日通商者然。

有人推測，蘇聯或將向南發展，計劃於巴勒斯登(Palestine)建築一規模宏大的提煉廠，提煉伊拉克(Iraq)油田的石油。伊拉克石油公司(英政府所辦，美法亦投少數資本)刻正向美國購買煉油機器，價值二百萬元美金。英國亦向美國定購大批煉油機器，行將於英國某港卸貨，上述種種，足示除美國外，其他各國，對於現代軍事機構所需之汽油的提煉工業，均缺乏之設備。

因需要增加，美國政府對於航空所用之汽油課稅奇重。提煉機器製造商，亦有應接不暇之勢，蓋因煉油廠，恐將來出貨需要增加，故競相添置機器，俾可增加產量也。

羅斯福總統曾發表談話，謂美國自身亦感不足之基本原料，絕不能聽任某國用以投機。所謂某國係指蘇聯而言。九月間，橡皮價格上漲百分之三十六，美國政府因無儲藏以應戰時之急需，故使美國大眾及國防工程，受害匪淺。美國對於橡皮之所以感覺缺乏，亦因國際橡皮調整委員會，不許英國出口橡皮，作為英美橡皮棉花物物交換協定的開始。該委員會冀圖屯積居奇，待價而沽。

最後，在九月間，美國因欲增造飛機及其他需用橡皮原料之貨物輸往英國時，美國感受橡皮的恐慌。於是該委員會(純由英人控制)方准於一九三九年最後三個月，每月供給全世界橡皮一萬二千噸。但九月中旬，蘇聯竟至紐約市場，購得橡皮至少三千噸，或近八千噸。蘇聯此舉係在羅斯福總統發表談話之先。

橡皮漲價還有一個原因，即新加坡之貨物，已不復取道地中海而遠繞非洲運往美國，結果水腳增高，且不免有被潛艇襲擊的危險。

會沒有停止的時候。

實在，馬克思雖說過「階級的差別會自然消滅」然而怎樣「自然消滅」，馬克思自己並未告訴我們，我們也無法知道。不過河上肇曾這樣的說：「過渡期如果完結，則在經濟方面，一切生產機關的國有就完全實現了。生產機關的國有既實現了，則私有生產機關者和沒有生產機關者的區別也隨之消滅了，即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階級消滅了」。

這個解釋還巧妙。但試問：所謂「過渡期」要繼續多少時候？馬克思一點也沒有回答。列寧也說：「我們不知道，也不是能夠知道的事」。假若這過渡期要繼續數百年，則這數百年中無產階級上握政權，處於支配階級的地位，那些屈服於專政下面的新無產階級不是要團結起來奪取政權來實行新無產階級專政嗎？並且無產階級既握着政權，則可立刻「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生產機關的國有就會完全實現」，要過渡期何用？至於「生產機關的國有完全實現」後，階級的區別就消滅了的話，前面我已辯過，並且俄國的事實便是絕好的證據，馬克思固未及見，然而河上肇解釋的時候，他却已見到了。

子欲無言集

葉紀懷

六〇 重慶現在是為法國而戰

日軍進攻南寧的時候，重慶方面曾這樣說：「日軍攻桂之目的，不是對中國而是對法屬安南」。滿想激起法國人的怒火，也好替中國撐一撐腰。無奈法國人頭腦簡單，不知他的所云，計算便落了空。

然而重慶心終不死，眼見南寧之反攻終無希望，於是念頭又轉到法國去了。據上月二十四日重慶合衆社電稱：「官方可靠消息：最近法國曾勸告中國與日本議和，中國政府常即予以嚴峻之拒絕。……法方對於南寧之戰爭，極為注意；認為日軍佔領南寧後，已獲有進攻安南之陸上據點；目前法國駐防安南之軍隊僅五萬名，其勢不能駐紮安南沿邊一帶，從事有效之防守，尤難抵抗日人海陸空三方面之攻擊，故內情極為惶急」。

真是極危詞聳聽之能事了呀！不過事實上，要調停中日戰爭，輪不到法國，法國也不致如此情急。至於安南受威

脅一層，雖非毫無理由，却是最近日法兩國的妥協（締結商約及準備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已夠反證其自己有辦法了。重慶曾一再大言不慚的說是必能把日兵逐出廣西，何不即以此語轉告法人放心大膽，倒是反過來一再鼓吹法國是怎樣怎樣「惶急」呢？

可知「內情極為惶急」者，不是法國，正是重慶。

本來，重慶的抗戰是一直以乞求他國「拔刀相助」為惟一厚望的。過去，「為英國而戰」，「為美國而戰」，又在國聯會中「為蘇俄而戰」，但皆沒有好處，只落得一串奚落。現在退而求其次，要為法國而戰了；不是嗎？日軍攻桂既是對法國，則華軍反攻自然也是「為法國」。

不料這些不識好歹的國家總是無情又無義！

六一 孫科兼任蘇聯外交官

孫公子可算得一位寶貝：他不僅擔當中國的大任。而且還能兼任蘇聯的外交官！

差不多十個月的時間，他在歐洲跑

來跑去，做些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却有一樁，很夠令人拜服，就是到處替蘇聯作說客，說蘇聯的「好」。

是十月間吧，他在倫敦遍訪英國當局及美日法各國外交人員，雖然他并未訪到過何等像樣的人物，但當他會見無論什麼人，總是滔滔不絕的替蘇聯辯護。對英國人說：蘇聯并不真心和德國要好；對美國人說：蘇聯不預備和日本妥協；對日本人呢，他說：蘇聯對於遠東是沒有什麼企圖的。這種孫科，不是蘇聯的外交官是什麼？

如今這位蘇聯外交官又出使到中國來了，到中國來替蘇聯大施簧鼓了。當他一到重慶的時候，就替蘇聯聲明：一、蘇聯無侵佔新疆之意；二、蘇聯將繼續援助中國之抗戰（上月十七日重慶電）；而且最近更進一步，為蘇聯侵略芬蘭一事，竭力辯護；他說：「蘇芬戰爭之起因，乃蘇聯恐他國將利用芬蘭以進攻。蘇芬戰爭既係蘇聯為本身安全」而發動者，故與其他戰事有別」（本月三日路透電）。這不是夠了嗎？全歐洲或全世界，只有蘇聯不差呀！

現在是盧布比法幣值錢的時候，孫公子的打算大概自有見地；但照我推想起來，恐怕連一盧布也還未到手吧？